

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親子數位互動的中介作用

林姿慎¹、周玉慧²

本研究應用華人「管教」概念，探討青少年知覺之父母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以及親子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作用，資料來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TASAL）於2022年蒐集之資料。選取性別、雙親健存、完整回答的國九學生5,430份資料（女2,454人，男2,976人）進行分析。使用變項包含知覺父母管教（生活管教、價值教導兩向度）、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溫暖支持、衝突緊張兩向度）。採取因素分析、*t*檢定、結構方程模式等方法進行分析。主要結果顯示：（一）青少年知覺父母重視「價值教導」甚於「生活管教」；（二）知覺「生活管教」愈高的青少年，其親子關係的溫暖支持愈低，衝突緊張愈高；知覺「價值教導」愈高的青少年，溫暖支持愈高；數位互動愈高者，溫暖支持愈高，衝突緊張愈低；（三）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間，及在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親子關係間，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四）管教、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間的影響機制在青少年男女間明顯不同，數位互動在青少男的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具中介作用，在青少年女生活管教及衝突緊張間具中介作用。本研究據此結果提出未來研究與青少年期親職教育的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管教、數位互動、親子關係、性別差異

¹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²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通訊作者：林姿慎，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morenda918@gmail.com。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文給予寶貴的建議。

家庭是個體重要的社會化場所，個體在家庭內藉著父母或主要照顧者的教養，建立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價值觀及行為準則。過往研究指出，家庭中的教養顯著影響親子關係，進而影響子女發展，甚至可能產生跨代傳遞的現象（Brook et al., 2000; Korniichuk & Oliinyk, 2022）。對於教養議題的研究，西方自 Baumrind（1967）提出以控制與溫暖回應兩向度區分四種教養類型以來，後續研究多依此進行探討，在教養類型、親子關係、親子互動以及教養對子女發展的影響等議題上，累積了豐富的文獻和理論架構（Darling & Steinberg, 1993; Maccoby & Martin, 1983）。然由於文化輿情的不同，西方文化偏向個人主義，強調情感支持和關愛，鼓勵子女自我表現，追求個人成長和發展（Baumrind, 1967），華人教養觀念偏向以家庭為中心，子女是家庭的成員非獨立個體，並因儒家文化的影響，以服從、孝順等觀念教導子女，維繫和諧的家人關係（林文瑛、王震武，1995）。這些文化上的意涵不含括在西方教養理論框架內，若未考慮華人的文化脈絡，逕直以西方教養理論解釋華人家庭的教養行為時，常會出現某些悖論（Chao, 1994）。例如華人父母對子女學業成就相當重視，父母願意以高度的親職參與和嚴格督促的行為來增進子女學習成就的成功，藉以光宗耀祖（吳明燁，2016；林姿慎、林如萍，2023），在督促子女確保其學習成就的過程中，父母的教養行為常被西方教養理論解釋為「專制」或「獨裁」等，認為有害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因此，香港學者 Chao（1994）提出「管」（guan）和「教訓」（chiao shun）等概念，試圖透過此概念來理解華人父母的教養，並與西方「民主權威」、「專制」、「獨裁」等概念區別；承接此脈絡，本研究以「管教」的概念探討華人父母親職行為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青少年期是心理和身體變化經歷迅速變化的時期，若父母與孩子能有良好互動則有助於青少年因應此時期歷經的變化。有關教養、親子互動與親子關係的研究指出，父母的教養，例如態度、教養風格、對發展知識的掌握度、對子女個性和喜好的理解與支持等，會透過親子間的互動和交流影響親子關係，進而型塑子女的身心發展（Şahin, 2014）。近年來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數位工具及網路的使用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數位相關產品和技術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消費、教育、娛樂等功能外，也改變了人際間的交流互動型態，讓互動和交流不再侷限於實體面對面的形式，更增添以數位設備，如手機、電腦等，在電信或網路等數位環境下進行的數位人際互動。數位互動具有不受時空限制且「虛實交錯」的性質，提供訊息處理時的同步性（synchronicity）和異步性（asynchronicity）（Stafford & Hillyer, 2012）。探討數位互動對人際關係影響的研究指出，數位互動能正向預測人際之間的關係品質及主觀幸福感（楊朝鈞、簡晉龍，2019；Stafford & Hillyer, 2012），數位互動讓原本不認識的人有得以接近甚至熟悉的機會（Toma, 2015），拓展人脈及縮小世代差距（吳仁偉，2011），數位互動也影響家庭間成員的交流（蔡淑琴，2013；Yang, 2018），展現數位互動對於人際關係的影響。也有學者探討數位媒體進入當代家庭生活引起的影響，提出人際間的交流可以是一種親職策略，在現代數位科技普及的環境下，父母可以善用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和情感交流來消除或彌平親職實踐所遇到的困難或挑戰（Clark, 2011）。

過去以華人「管教」概念探究教養與親子關係關連的研究甚少，加上科技進步帶來數位環境的日新月異，數位互動對人際關係的影響日深，在「管教」這個比較嚴肅的議題和親子關係之間，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可能展現促進和緩衝作用，本研究依據 Chao（1994）等相關學者對華人家庭的研究，以「管教」一詞指涉教養概念，探究華人父母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進一步探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以下簡稱「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作用。

文獻探討

（一）「管教」與西方教養行為的差異

Chao（1994）提出「管教」概念解釋華人父母的教養行為，後續學者以此概念陸續補充管教與西方教養行為的差異（吳明燁，2016；Garcia et al., 2020; Piquart & Kauser, 2018; Wu, 2013）。華人文化將管教視為是家長的角色和責任，相關研究認為，「管教」的某些形式看似與西方的教養行為相仿，但文化內涵殊異，尤其華人父母對教育成就價值的信念，是華人教養文化的一個關鍵特徵，貫穿整個子女的成長（吳明燁，2016；Chao, 1994）。在幫助子女取得學業成功的過程中，父母常提供各種支持（如有利學習的環境），並對各種可能危及學習的活動進行干預及控制（例如限制交

友或上網時間等）（吳明燁，2016；Peng & Wright, 1994）。研究發現，這種「支持」伴隨「控制」的「混合」教養（blending of voices）（吳明燁，2016；Wu, 2013），使得華人青少年即使歷經一些從西方教養觀點看似專制、威權，可能對其情緒控管、身心發展與學業表現造成危害的管教行為，但其實在適應上並無不良症狀，甚至在學業成就上表現更優異（Wu, 2013），這體現了「管教」與西方教養行為在意涵和結果上的不同。學者們指出，因為華人子女能體會父母這種兼具「治理」、「訓練」、「關心」及「愛」的教養行為（Chao, 1994; Tobin et al., 2009），讓原本強調父母需為孩子的行為和成就提供指導，子女必須忠誠遵循父母長輩教導的管教意涵，多了子女對父母行為的理解和服從（林文瑛，2003），這些被西方視為有控制和階級支配意味的管教，對華人青少年來說其實代表著慈愛和關懷（Wu, 2013）。本研究順此研究脈絡，以「管教」代替西方教養行為的論述。

（二）不同領域的管教

無論是華人文化的管教概念，或西方的教養行為的探討，多半都將教養看成一個整體，較少考量不同的生活領域（林惠雅，2012）。社會學者應用領域理論（social domain theory）（Turiel, 1983）探討父母權威在青少年管教上的影響，提出家長在不同的領域可能有不同的管教方式，子女也可能因為家長在不同領域的管教而有不同的反應（Smetana, 2006），例如家長對於子女穿著、打扮、幾點回家等生活領域的管教，與教導子女做人做事等價值觀的管教可能有所不同，為更貼近真實情境，學者在探討父母管教對子女反應及親子關係的影響時，強調需區分不同領域不同事件的管教議題。各學者對於領域的分類相當分殊，大致可分為「道德領域（moral domain）」、「習俗領域（convention domain）」、「個人領域（personal domain）」、「友誼領域（friendship domain）」、「安全領域（prudential domain）」、「學業成就領域（achievement domain）」等（林惠雅，2012；胡肇勳、程景琳，2007；Darling et al., 2007; Smetana & Asquith, 1994）。過去研究顯示，父母和子女對不同領域父母管教權威的認定有所差異，且領域之間常有重疊性，研究無法精確判斷親子對管教的差異屬於何種領域，加上不同學者在運用領域理論研究管教與親子關係，結果各有不同（Baumrind, 2005; Darling & Steinberg, 1993; Nucci, 1996），因此後續研究聚焦於特定領域（如道德、個人生活）（Smetana & Daddis, 2002; Yoo & Smetana, 2022），或是合併不同領域成多面向領域（multifaceted domain），以處理領域模糊及重疊的分歧（Baumrind, 2005）。

對被教導者而言，價值觀取向的「道德領域」教導牽涉到需運用某些獨立性或不可改變性的原則（例如公平、負責、保障他人福祉等）來判斷、規範自己的行為（胡肇勳、程景琳，2007），其他領域的教導可視所處位置或不同情境做出選擇及改變。因此，道德領域的教導對父母管教的正當性和嚴格性而言，有較高的規範。加上華人教養價值觀重視和諧、尊重長者和權威（林文瑛、王震武，1995；Chan et al., 2022），並希望藉由正義、誠信、忠誠等原則來指導子女價值觀的形成，本研究據此將管教領域分為兩個面向：一是與涉及社會的規範、倫理、道德、價值等抽象概念有關的價值觀教導，二是將與個人日常生活實際事件相關、連結個人行動方式和處事能力，例如友誼、安全、個人或學業等領域，合併為生活領域。

（三）生活領域及價值觀領域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親子關係常以子女感受與父母的親近程度或信任度作為正向關係、以感受到衝突經驗的多寡作為負向關係的表徵（吳明燁，2016；程雅好、王郁琮，2021）。對青少年而言，正向親子關係有助於青少年自尊及整體幸福感的提升，負向的親子衝突則容易導致敵對關係，引起負面情緒，進而促發問題行為，不利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吳明燁，2016；Işık Akın et al., 2020; Niu et al., 2020）。因親子關係同時存在正面及負面的元素，且青少年階段正處於親子權力結構此消彼長的階段，學者一致認為研究親子關係需從這兩種向度來詮釋，較能符合親子關係動態發展的歷程（吳明燁，2016；周玉慧，2015；Luescher & Pillemer, 1998）。

關於父母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不同理論的觀點殊異，社會學習論認為個體通過觀察、模仿他人行為而產生學習，父母是子女學習的楷模，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是子女通過觀察父母的行為，以及與他們的互動來做學習。依據社會學習論，如果父母展示積極、穩健和理性的行為，子女更有可

能模仿這種行為，並從這種楷模學習中產生對父母的尊敬和愛戴（Duncan et al., 2009; O'Connor et al., 2013），但如果觀察父母的言行不一，極可能因為對父母的管教產生不信任感，不服從管教甚至反抗，進而造成親子關係緊張（Hall, 1987）。而社會心理發展論則認為，青少年期正逢「身份認同與角色混淆」（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在這一階段，青少年開始探索自我身份和定位，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社會角色（Erikson, 1994）。父母的管教方式對於青少年的身份認同發展和親子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父母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幫助青少年形成積極的自我認同感，給予青少年適度的自主空間和自主權，能夠促進良好的親子互動，維持健康的親子關係。

隨著青少年期對自主性需求增加的發展，對父母管教行為的認知和服從，在不同領域的管教出現不同的樣態，林惠雅（2012，2014）研究發現，因為對管教領域的看重程度或詮釋角度不一樣，使得青少年在服從的態度和行為上有所差異，進而影響親子關係。國內外的研究一致顯示，父母和青少年最為看重價值規範領域，青少年認為父母有權力就價值規範的領域制訂管教規則，且自己有遵守的義務，服從的態度也最高，亦即認為對價值規範的教導，即使不認同父母制訂的規則也有遵守的義務（林惠雅，2012；Yoo & Smetana, 2022）。這種看重使得青少年恪守父母對於價值的教導，在父母從事價值教導時也較為順遂。而根據社會學習論的觀點，子女會通過觀察和模仿父母的價值觀和行為，內化成為自己的價值觀及態度。其中，最高的模仿層次為象徵模仿（symbolic modeling），指觀察者模仿「楷模」的性格、特質，或其行為所代表的意義（Bandura, 1986），類似價值觀或態度的內化，父母在價值觀的傳遞過程中，展現出值得尊重的行為，子女更有可能學習並內化這種行為，且衍生出對父母的敬重。基於對價值教導領域的看重，加上社會學習論的象徵模仿行為，本研究假設父母對子女價值教導會促進親子關係的正向發展。

相較價值規範領域，與生活事件有關的管教領域則是引起親子衝突較大的領域，由於生活領域多涉及跟個人的社交、休閒、友誼、學習等事項，往往被青少年劃入屬於他們自己的事務，希望自己掌控的程度較高，不希望父母介入，這樣的認知影響青少年實際的服從態度或行為，當父母對這個領域進行干涉時，可能會引起親子關係的緊張衝突。而相關研究也指出，青少年的年齡與生活領域管教具有交互作用，年齡越大的青少年越不希望父母涉入生活領域的管教，且對於何種事件屬於生活領域的解釋也越容易與父母意見相左（林惠雅，2012；Smetana, 2006; Yoo & Smetana, 2022）。Steinberg（2001）曾以父母要求維持清潔房間，子女卻認為是個人生活的選擇為例，說明父母和青少年對生活事件定義差異可能導致的親子衝突，父母對子女生活領域的管教易於引起負向親子關係，同時也證明青少年對自主權的要求及個體化發展的特性。

本研究關注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依據過去研究所述，考量親子對管教領域的認知、看重程度、子女對管教可能的服從態度因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領域而不同，因此假設不同領域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殊異：

假設一：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在生活領域的管教越多，其親子關係越差（溫暖支持低、衝突緊張高）。

假設二：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在價值規範領域的管教越多，其親子關係越佳（溫暖支持高、衝突緊張低）。

（四）親子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作用

當代人們生活在科技無所不在的數位環境中，數位工具的便捷性和即時性使得隨時隨地的互動變成可能，不論視訊通話、傳送訊息、心情分享、共同線上娛樂等人際互動均可不受地理及空間距離的限制進行，此種數位環境深刻影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互動，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理論即敘述此一現象（Steinfeld, 1986）。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電腦中介溝通已轉變為各種以數位工具（例如手機、平板、電腦、智慧型穿戴裝置等），及多種計算機技術形式（例如網路、電子郵件、簡訊服務、即時通訊、聊天及社交網站等）的人際互動方式（Yao & Ling, 2020），並成為人際關係的發展和維護不可或缺的一環（Walther, 2011），融入使用者的生活中。家庭成員的互動，如親子間的互動，也因電腦中介傳播技術的興起，由以往面對面的溝通型態，加入數位互動，不僅豐富了親子間的溝通與互動方式，也影響了親子關係。因此，電腦中介傳播的「中介」（mediate），除了指數位工具或技術作為一種傳播的媒介外，也意涵以這種媒介的數位互動，

在人際溝通和關係之間所帶來的影響。

數位互動在父母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之間的作用因家庭生命階段而呈現不同樣態（Bacigalupe & Lambe, 2011; Bartholomew et al., 2012; Carvalho et al., 2015; Davies & Gentile, 2012; Lanigan, 2009; Mesch, 2006）。子女學齡前與國小階段的數位互動主要是父母發起，父母可能會因為教育目的，使用較多的科技輔助工具來教導子女，或是與子女共同觀看資訊的模式，與子女一同從事數位活動（Davies & Gentile, 2012; Huisman et al., 2012）。子女進入青春期的後，青少年子女和其中年父母因同時面臨各自的發展的需求，使得此時期的親子關係容易因為管教產生摩擦（周玉慧等人，2010），此時，以文字、影像、圖像或符號為主，不需面對面，可以同步或非同步，且具主動性，雙方皆可發起的「數位互動」，成為青少年與父母的另一種溝通方式，可以延續現實互動中的不足，促進親子關係（Walther & Burgoon, 1992）。一份對國中生手機使用行為及親子互動的研究指出，超過八成的學生家長贊成子女使用手機，最大好處是可與子女「聯繫方便」，且國中生的手機使用行為也與其親子關係呈現正相關（蔡淑琴，2013）。另一項針對大學新生所做的研究指出，大一新生因處在生涯及居住環境轉換的階段，空間上的距離使得他們無法與家人有實際的互動，在社群媒體上與父母的互動提供了聯繫和表達感情的空間，父母的支持也讓他們度過轉換期的壓力和孤獨寂寞感（Yang, 2018）。

數位互動具有社會臨場感低與媒介豐富度高的特色，當父母執行對子女的教養行為時，能夠維持親子關係，在親子出現爭議或摩擦時也能產生緩衝作用（賴明政、陳佳君，2016）。對父母來說，當孩子進入青少年期並渴望獲得更多自主權時，父母也需要調整自己的角色，青少年子女在去依附、型塑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父母往往會感到對孩子的生活參與度降低，且隨著子女成長逐漸失去父母的角色作用（Kloep & Hendry, 2010），若能採取數位互動方式介入或參與子女的生活，子女可能更容易接受父母欲傳遞的訊息，減輕父母的失落感（Yang, 2018）。另有研究指出，父母希望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更了解子女，甚至希望能夠學習子女的學習內容，以此來實現與子女的共情或同頻共振（翟健，2022）；數位科技及通訊軟體帶來的便利性，確實讓家有青少年子女的父母也能感受到他們所渴望的親密感（Yang, 2018）。

綜上所述，透過科技工具或通訊軟體的數位互動，父母能即時掌握子女的生活及心理狀況，給予關懷及支持，增進青少年心理健康，親子間也能互相分享重要資訊、生活經驗和知識，促進親子關係（Bacigalupe & Lambe, 2011; Yang, 2018）。尤為重要的是，當父母執行管教對親子關係產生正負向影響時，數位互動在父母管教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能促進其正向影響、降低其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降低生活領域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負向影響。

假設四：數位互動在價值教導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提高價值觀領域教導對親子關係的正向影響。

（五）性別差異

個體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性別可能在思維發展、情感表現和具體經驗上有所差異，又在照顧者用不同態度對待不同性別的方式，使得後續發展上持續擴大差異性（王珮玲等人，2015）。親子關係研究中，不同性別子女與父、母是否存在不同的互動方式及情感內涵一直是研究關注的焦點（程雅好、王郁琮，2021），Shek（2000）也主張，親職行為相關研究應注重父母子女不同性別的影響，以求展現教養的全貌。對於數位互動在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間的影響探討尚在起步階段，亦應重視青少年性別可能在此影響機制中產生的調節作用。

研究不同性別國中生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發現，影響青少男及青少女幸福感的因素不同，相較於青少男，父母的關懷教養更能影響青少女的幸福感（翁敏甄、陳嘉成，2018），Keijsers 等人（2010）對於青少年親子互動及與父母關係影響的研究指出，隨著青少年期對自主和獨立需求的增加，青少年會將個人的訊息或生活狀況保密，不多與父母共享這部份的資訊，以在個人與父母之間建立界線，縱貫性資料研究青少男與青少女對父母保留訊息的數量發現，隨著年齡增加，青少男對父母保留訊息的數量較青少女大，在生活領域減少與父母互動溝通的狀況較青少女多，但親子關係卻不因為互

動減少改變，而青少年在青春期中後期及成年初期與父母減少互動溝通的狀況雖然比青少年少，但減少與父母的互動溝通後卻造成親子關係品質的降低。另一項對青少年男女的研究指出，因為對自主權及個性化的要求，父母對青少年期的管教較其他發展期更易產生衝突，其中，青少年比青少年更易與父母產生衝突，且衝突的產生和協商互動的過程會影響後續的親子關係及青少年的發展（Ashraf & Najam, 2011; Branje, 2018）。

綜上所論，父母管教在親子互動及親子關係上的影響確實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然現階段尚未見研究探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是否有青少年性別差異，也未見研究探討數位互動在教養行為與親子關係間的影響機制是否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故本研究提出初步假設如下：

假設五：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數位互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

方法

（一）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之「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簡稱 TASAL），此計畫為瞭解課程改革成效，針對學生學習能力的發展進行長期追蹤調查。在新興科技潮流趨勢下，此計畫亦與國科會專題計畫「臺灣數位世代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計畫」（Taiwan i-Generation Panel Study, TIGPS）合作，從家庭、學校及班級等各個青少年成長的生態環境，來瞭解數位環境下的親師參與、教學、學校策略、家庭動力等現況，以因應數位轉型，為未來教育政策的規劃建立基礎（見 TASAL 網頁，<https://tasal.naer.edu.tw/>）。

本研究選取 TASAL 與 TIGPS 合作之前期規劃資料（國家教育研究院，2022），原訂 2022 年 6 月蒐集，因 COVID-19 疫情而延至 2022 年 10 月蒐集國九學生資料。全臺抽樣 187 個學校，每校一個班級，共 6,160 名學生參與。本研究選取原始 6,160 份資料中，完整回答父母管教、親子間數位互動與親子關係等題項，以及性別、雙親健存的 5,430 份資料（女 2,454 人，佔 45.20%，男 2,976 人，佔 54.80%）進行分析¹。

（二）主要變項之測量

本研究使用之主要變項為父母「管教」題組、親子間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均為青少年自陳，以下逐一詳加說明：

1. 管教

共有十個題項，詢問青少年「目前父母會管教你這些事情嗎？管得嚴不嚴？」計有家長對於青少年「穿著、打扮、造型」、「幾點鐘回家」「唸書、考試」……及「對長輩態度」以及「做事有無負責任」等事項的管教情形，量表分數從「一點都不嚴格 = 1」到「很嚴格 = 4」之李克特四點量尺，分數越高表示父母在管教上越嚴格。採取主軸因子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十題為兩個因素，除其中一題因素負荷量過低予以刪除外，其餘依文獻探討分別命名為「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其 KMO 值為 .86，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57 ~ .88 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52.42%，內在一致性 α 係數分別為 .85 及 .84。因素分析結果及信度分析整理於表 1。

為探究管教分為「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兩面向的適配性，進一步採取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式適配值 $\chi^2(24, N = 5,430) = 403.64, p < .001$ ，CFI = .98，TLI = .97，RMSEA = .05，SRMR = .03，均在標準之內，代表模式適合度佳，符合本研究的構念。

2. 親子間數位互動

親子間數位互動題項之測量，為青少年回答與父母在數位媒體上的互動狀況，包含子女主動題項：「你會和雙親在社群媒體上互動」、「你會在社群媒體上傳送照片或訊息給你雙親」，及父母

主動題項：「雙親會陪你一起上網」、「雙親會和你一起聊網路上發生的趣聞或事件」和「雙親會和你討論使用網路的情形和心得」等五題，採四點量尺，回答「從未」為1分、「偶爾」為2分、「有時」為3分、「經常」為4分。採取主軸因子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五題為同一因素，KMO 值為 .76，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4 ~ .75 之間，解釋變異量為 42.62%，內在一致性 α 係數為 .79。

3. 親子關係

詢問青少年與雙親相處情形，題幹為「父親／母親和你相處情形如何？」，答項為「批評你或指責你」、「理解你、肯定你的想法」、「關心你」……等五題，分數為「從未 = 1」至「經常 = 4」的四點量尺。分別對青少年與父親、與母親相處情形的題項進行主軸因子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論是與父親或母親的相處情形，均可區分出清楚的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溫暖支持」（3題）及「衝突緊張」（2題），不論與父或與母的關係，其KMO 都在 .70，父及母兩因素的解釋變異量接近（父：59.84%，母：61.28%），各因素內之題目亦一致，內在一致性 α 係數分布在 .70 ~ .84 之間。

由於青少年與父親關係和與母親關係的相關高（ $r = .53, p < .001$ ），本研究後續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時，進一步將父親「溫暖支持」三題、母親「溫暖支持」三題彙整為正向親子關係「溫暖支持」的潛在變項，父母「衝突緊張」各兩題彙整為負向親子關係「衝突緊張」潛在變項，形成親子關係的兩個構面。

表 1
各題項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構面	題項	因素負荷量	α 值
管教	你的穿著、打扮、造型	.67	.85
	和朋友的活動	.69	
	談戀愛	.77	
	每天要幾點鐘回家	.62	
	上網時間	.59	
	唸書、考試	.59	
	零用錢使用	.57	.84
	對長輩的態度	.76	
	做事有沒有負責任	.88	
數位親子互動	你會和雙親在社群媒體上互動	.66	.79
	你會在社群媒體上傳送照片或訊息給你雙親	.64	
	雙親會和你一起聊網路上發生的趣聞或事件	.75	
	雙親會和你討論使用網路的情形和心得	.67	
	雙親會陪你一起上網	.54	
親子關係	關心你（母）	.81	.84
	提供解決問題的經驗，給你參考（母）	.77	
	理解你、肯定你的想法（母）	.81	
	關心你（父）	.78	
	提供解決問題的經驗，給你參考（父）	.77	.83
	理解你、肯定你的想法（父）	.78	
	跟你常有衝突，彼此關係緊張（母）	.70	.70
	批評你或指責你（母）	.76	
	跟你常有衝突，彼此關係緊張（父）	.77	
	批評你或指責你（父）	.69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資料分析分成四個部分，採取 SPSS 26 版與 Mplus 8.0 統計軟體進行。首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次進行各變項描述性統計、相關檢定，及變項間的相關分析；接著採取兩步驟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驗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關係（直接

模式)，以及數位互動、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的間接途徑（中介模式），採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行參數估計，並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進行模型的間接效果檢定；最後，以結構方程模式比較男女在各路徑的差異，檢視性別的調節作用。

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以描述性統計初步瞭解各變項的整體狀況，並進行 t 檢定，各變項平均數、標準差及與量表中心值差異檢定、青少年男女在個變項間的差異檢定等，結果整理於表 2。由表 2 可知，各變項與量表中心值 2.5 均有顯著差異，生活管教、數位互動，及衝突緊張低於量表中心值（生活管教 $t = -32.71, p < .001$ ，數位互動 $t = -41.13, p < .001$ ，衝突緊張 $t = -42.72, p < .001$ ）；價值教導及青少年與父母的溫暖支持則顯著高於量表中心值（價值教導 $t = 44.79, p < .001$ ，溫暖支持 $t = 79.94, p < .001$ ）。性別差異部份，青少男與青少年在生活管教、價值教導、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各面差異性均顯著，青少年感知的生活管教、價值教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溫暖支持顯著高於青少男（生活管教 $t = 6.23, p < .001$ ；價值教導 $t = 2.81, p < .01$ ；數位互動 $t = 14.60, p < .001$ ；溫暖支持 $t = 2.63, p < .001$ ），與父母的衝突緊張低於青少男（ $t = -5.65, p < .001$ ）。

表 2
各向度平均值、標準差及相關 t 檢定結果

	全體			量表中值差異		女		男		性別差異
	M	SD	t	M	SD	M	SD	M	SD	t
生活管教	2.22	.63	-32.71***	2.28	.61	2.17	.64	2.17	.64	6.23***
價值教導	2.99	.81	44.79***	3.03	.78	2.97	.84	2.97	.84	2.81**
數位互動	2.11	.70	-41.13***	2.26	.71	1.99	.66	1.99	.66	14.60***
溫暖支持	3.22	.67	79.94***	3.25	.66	3.20	.67	3.20	.67	2.63**
衝突緊張	2.11	.68	-42.72***	2.05	.67	2.15	.68	2.15	.68	-5.65***

** $p < .01$. *** $p < .001$.

另外，以受試者內 t 檢定檢視青少年對生活管教與價值教導的知覺差異，以及青少年與父母親正負關係的差異。結果顯示，無論是全體，或是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價值教導分數高於生活管教（全體 $t = -75.90, p < .001$ ，女生 $t = -51.06, p < .001$ ，男生 $t = -56.20, p < .001$ ），表示青少年知覺父母對價值觀領域的管教嚴格度大於生活領域；親子關係方面，結果一致呈現父母的溫暖支持高於衝突緊張（全體 $t = 77.19, p < .001$ ，女生 $t = 55.53, p < .001$ ，男生 $t = 54.06, p < .001$ ），意味青少年與父母的關係明顯較為正向良好。

各變項之間的兩兩相關如表 3，不論青少男或青少年，知覺父母價值教導越高者，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越高，衝突緊張親子關係也越高；與父母的數位互動越多者，親子關係也越佳（溫暖支持越高、衝突緊張越低）。不過，生活管教則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青少男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越高者，與父母的關係越差（溫暖支持越低、衝突緊張越高），但青少男的生活管教與數位互動無顯著相關；而青少年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越高者，與父母數位互動越少、與父母的衝突緊張越高。

表 3
全體及青少男、青少女主要變項之兩兩相關

		生活管教	價值教導	數位互動	溫暖支持	衝突緊張
3-1	生活管教	—				
	價值教導	.48***	—			
	數位互動	.00	.07***	—		
	溫暖支持	-.04**	.08***	.36***	—	
	衝突緊張	.28***	.15***	-.15***	-.25***	—
3-2	生活管教	—	.48***	.02	-.05**	.29***
	價值教導	.48***	—	.05*	.09***	.15***
	數位互動	-.06**	.09***	—	.34***	-.09***
	溫暖支持	-.03	.06**	.39***	—	-.22***
	衝突緊張	.28***	.15***	-.18***	-.30***	—

註：3-1 為全體 ($N = 5,430$) 主要變項之相關係數，3-2 為分別就青少男及青少女變項間之相關係數。3-2 左下角為青少女資料 ($N = 2,454$)，右上角為青少男資料 ($N = 2,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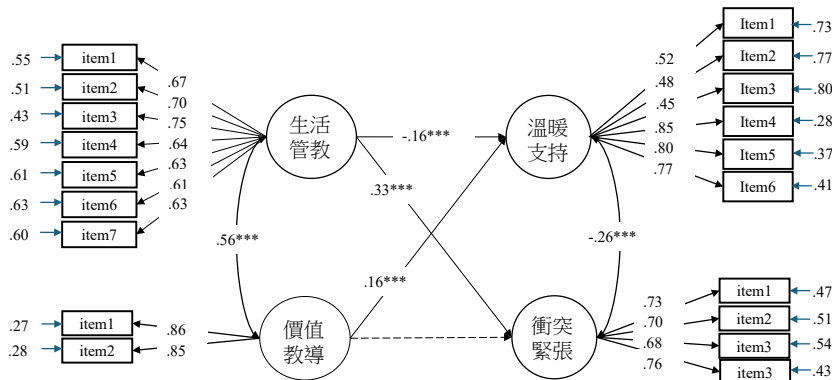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二)「管教」與親子關係的結構方程模式(直接模式)

本研究潛在變項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題項間具有適度的共同變異， $\chi^2(234, N = 5,430) = 2675.89, p < .001, CFI = .95, TLI = .95, RMSEA = .05, SRMR = .05$ ，各變項組合信度 (CR) 皆達 .70 以上，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均在 .30 以上 (數位互動 CR = .77, AVE = .41；生活管教 CR = .85, AVE = .45；價值教導 CR = .82, AVE = .73；溫暖支持 CR = .83, AVE = .45；衝突緊張 CR = .82, AVE = .55)，表示題項信度佳 (邱皓政, 2011；Hair et al., 2010)，適於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首先，結構方程模式的直接模式檢定結果為： $\chi^2(137, N = 5,430) = 1814.76, p < .001, CFI = .96, TLI = .95, RMSEA = .05, SRMR = .04$ ，除了 $\chi^2/df = 13$ 不符合模式適配標準外，所有適配度指標均符合標準。 χ^2 的值極易受到樣本數與模式複雜度的影響，而其他所有指標顯示此模式在可接受的適配範圍。由圖 1 結果可知，管教對親子關係投入具有直接效果的影響力，其中，生活管教對溫暖支持的負向關係顯著 ($\beta = -.16, p < .001$)，與衝突緊張的正向關係顯著 ($\beta = .33, p < .001$)，本研究假設一：父母對子女在生活領域的管教越多，親子關係越差 (溫暖支持低、衝突緊張高)，獲得證實。價值教導對父親溫暖支持的正向關係顯著 ($\beta = .16, p < .001$)，與衝突緊張無顯著相關，本研究假設二：父母對子女價值領域的管教越多，親子關係越佳 (溫暖支持高、衝突緊張低)；而研究結果顯示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正向相關顯著，與衝突緊張的路徑係數不顯著，假設二獲得部份證實。

圖 1
「管教」與親子關係結構方程模式(直接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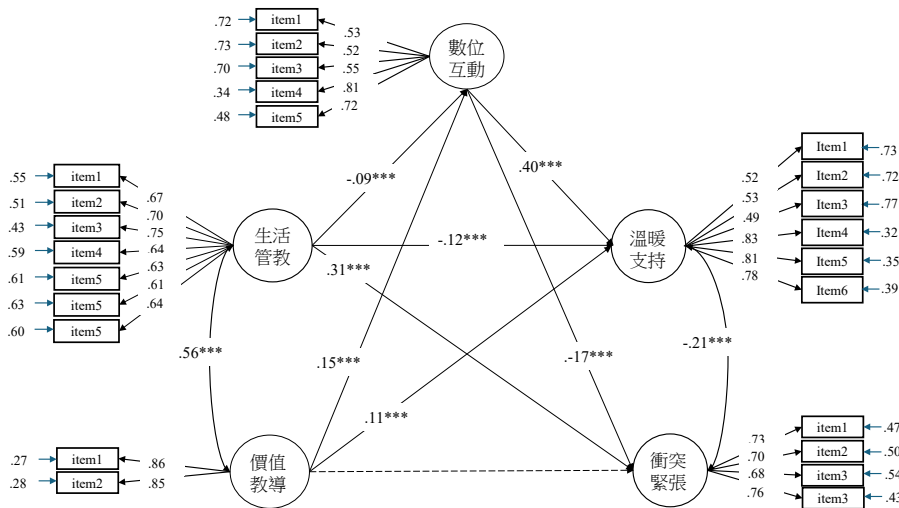
(三)「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之中介作用(中介模式)

接著以結構方程模式檢驗「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價值教導與親子關係之中介模式，其適配指標相當良好： $\chi^2(234, N = 5,430) = 2675.89, p < .001, CFI = .95, TLI = .95, RMSEA = .04, SRMR = .04$ ，結果整理於圖 2。

以數位互動作為中介變項後，生活管教對親子關係兩構面的路徑皆仍具有顯著效果，其中溫暖支持($\beta = -.12, p < .001$)、衝突緊張($\beta = .31, p < .001$)皆達顯著，顯示生活管教越高，親子間正向的溫暖支持越低，負向的衝突緊張越高；價值教導對溫暖支持也達顯著($\beta = .11, p < .001$)，價值教導越高，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也越高，但價值教導對衝突緊張的解釋不顯著。生活管教對數位互動的解釋達顯著水準($\beta = -.09, p < .001$)，生活管教越高，親子「數位互動」的程度越低；價值教導對數位互動的解釋達顯著水準($\beta = .15, p < .001$)，價值教導越高，親子「數位互動」的程度越高。親子「數位互動」對溫暖支持和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影響也皆達顯著(溫暖支持： $\beta = .40, p < .001$ ；衝突緊張： $\beta = -.17, p < .001$)，親子間的數位互動越高，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越高，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越低。

圖 2

「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之中介作用(中介模式)



為了確認「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間接效果，以拔靴法進行檢定，其結果整理於表 4。從表 4 可知，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與衝突緊張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beta = -.02, p < .001$)，生活管教越高，親子間衝突緊張越高，但在「數位互動」加入後，其係數變小，本研究假設三：「數位互動在生活管教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降低生活領域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負向影響」，分析結果證實假設三成立。而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的中介作用亦顯著($\beta = .04, p < .001$)，價值教導越高，溫暖支持越高，且價值教導亦能藉數位互動提升溫暖支持親子關係，研究假設四：「數位互動在價值教導及親子關係間具有中介作用，提高價值觀領域教導對親子關係的正向影響」亦成立。另外，由於價值教導對衝突緊張親子關係無直接效果，故未檢定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作用。

(四) 性別的調節作用

同樣以結構方程模式區分性別檢驗青少男及青少女之管教、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影響機制，不同性別之模式適配度分別為：青少男： $\chi^2(235, N = 2,976) = 1645.21, p < .001, CFI = .95, TLI = .95, RMSEA = .05, SRMR = .04$ ，青少女： $\chi^2(235, N = 2,454) = 1799.02, p < .001, CFI = .94, TLI = .93, RMSEA = .05, SRMR = .05$ ，兩者模式適配皆頗為良好，其結果整理於圖 3。

表 4
數位互動在管教與親子關係之間接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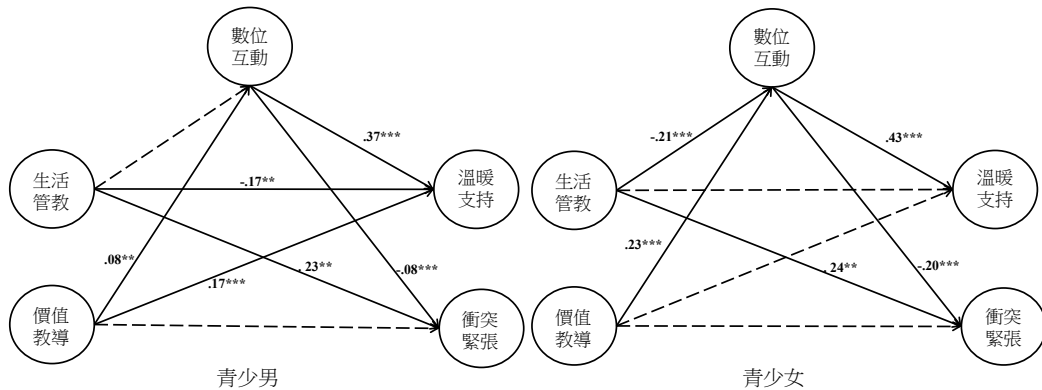
路徑	β	Sobel's Z	95% CI LL	95% CI UL
生活管教→數位互動→溫暖支持	-.04***	-3.82	-.06	-.02
價值教導→數位互動→溫暖支持	.04***	6.04	.03	.05
生活管教→數位互動→衝突緊張	-.02***	-3.62	-.01	-.03

註：檢定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作用。

*** $p < .001$.

由圖 3 可知，管教、數位互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性別而不同，本研究假設五：「青少年知覺父母管教、數位互動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青少年性別而不同」成立。特別在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路徑係數上，青少男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顯著負相關（ $\beta = -.17, p < .01$ ），青少女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則無顯著關聯；青少男知覺父母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顯著正相關（ $\beta = .17, p < .001$ ），但青少女則無顯著關聯；而在生活管教對數位互動的路徑係數上，青少女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越高，數位互動越少（ $\beta = -.02, p < .001$ ），青少男知覺父母生活管教則與數位互動無關。

圖 3
不同性別管教數位互動與親子關係結構方程模式



關於價值教導對數位互動的路徑係數上，青少男與青少女都顯著（青少男： $\beta = .08, p < .01$ ；青少女： $\beta = .23, p < .001$ ），數位互動對溫暖支持路徑係數在青少男與青少女均有顯著正相關（青少男： $\beta = .37, p < .001$ ；青少女： $\beta = .43, p < .001$ ），與衝突緊張皆為負相關（青少男： $\beta = -.08, p < .01$ ；青少女： $\beta = -.20, p < .001$ ）。數位互動對青少男知覺父母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的中介作用顯著（ $\beta = .02, p < .05, \text{Sobel's } Z = 2.40, 95\% \text{ CI LL} = .00, 95\% \text{ CI UL} = .03$ ），數位互動對青少女知覺父母生活管教與衝突緊張間的中介作用顯著（ $\beta = .24, p < .001, \text{Sobel's } Z = 4.61, 95\% \text{ CI LL} = .02, 95\% \text{ CI UL} = .04$ ）。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從殊異於西方親職文化的「管教」意涵，以及在不同領域的管教概念，探討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的生活管教和價值教導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檢視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機制，以及不同性別的調節作用。

首先，青少年知覺的父母「生活管教」顯著低於量表均值，而「價值教導」顯著高於量表均值，且不論是全體樣本或是不同性別青少年，知覺的父母價值教導嚴格性均明顯高於生活管教，意味臺灣家庭重視「價值教導」甚於「生活管教」。根據過去對青少年感知父母管教以及服從行為的相關研究顯示，無論是親代或子代，對不同領域管教的重要性看法都相當一致，認為對「道德領域」設定規則要遠高於其他如「友誼領域」或「個人生活領域」等，凸顯親子兩代對道德倫理、規範及價值教導的一致重視（林惠雅，2012，2014），就這一點來看，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而數位互動低於量表均值，意味青少年知覺與父母間以數位工具和網路使用進行互動的情況偏低，推測其原因可能有二：父母缺乏與子女進行數位互動的能力，或是子女不願意與父母數位互動。根據 Prensky（2001）的研究，這些青少年的父母可能屬於 Prensky 所說的數位新移民，與他們屬於數位原住民的子女在科技使用技術上有明顯數位落差，而缺乏介入子女使用數位科技的能力；亦或是青少年對自主性需求、獨立的渴望和他們對父母權威的抵制，使他們不願父母過多地介入他們使用數位設備或在網路的社交互動，這兩種可能性有待日後研究繼續探討。至於親子關係部份，青少年一致認為與父母的溫暖支持高，衝突緊張低，且正向的溫暖支持關係顯著高於負向衝突緊張，意味臺灣國九時期青少年的親子關係良好。

本研究設定的模型適配度堪稱良好。就整體而言，「生活管教」減弱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增加親子的衝突緊張，結果支持假設一，也與過去大眾普遍對青少年期子女管教容易破壞親子關係的認知相似。從心理發展論而言，青少年期正面臨身份認同與角色混淆的階段，「認同形成」（identity formation）是青少年階段中重要的發展任務之一，青少年希望藉由與父母建立界線來增加自我認同的形成，減低父母在個人領域事件的管教可增加自主性，生活事件的完成也能增加自我效能，形成良好的自我概念，這可能是「生活管教」增加親子衝突緊張的原因。但界線會增加親子間的距離，減少彼此理解，進而影響親子關係。青少年尚在發展階段，缺乏成年人的成熟度，家長在其社會化過程仍發揮關鍵作用。父母在親子關係與界線建立之間如何取得平衡？考驗父母的智慧。研究發現，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行為向子女示範（即父母的以身作則），並創造積極的家庭氛圍，更容易有效傳遞日常生活應遵循的規則或誠律（Brouwer et al., 2023）。此外，尊重子女的界線，對青少年子女採用誘導性管教（Costin, 2022），給予行為的解釋機會和論據，幫助子女理解行為的後果，並強調同理心，讓子女理解他人感受，促進內在化規範，在溝通和理解的過程中，讓管教成為親子情感連接的機會，並在不傷害安全的可接受範圍內，讓子女承擔因未遵守規範導致的自然後果（Marchant et al., 2004）等，都是可以讓青少年子女建立更好生活規範的方式。

而「價值教導」對親子關係的影響頗值得注意，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正相關、與衝突緊張無顯著相關，此結果部份支持假設二。價值教導不僅不會引起親子間的衝突緊張，反而增進親子間正向溫暖支持的感受！除了追求自主，青少年的身份認同也建立在對人生哲學、價值觀與理想的選擇上，希望統合與自己相關的多個層面，形成協調一致的自我概念，但此時身心發展未臻於成熟，在認同形成的過程中會面臨各種困惑，社會學習理論提供了可用於理解青少年行為的重要學習原則（Bandura, 1986），當整合自我概念遇到困難及挑戰時，青少年即向環境中的重要他人學習，以促進整合的能力。家庭是青少年重要的社會化場所，父母是重要他人，過去探討價值觀代間傳遞的研究指出，父母與青少年有相似的價值觀是成功社會化的標誌，且青少年認同父母的價值觀也被認為是有良好的親子關係的證明（Barni et al., 2023）。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呼應社會學習論與價值觀代間傳遞研究，青少年子女知覺父母對子女在價值領域的教導愈多，其親子關係愈好，也因為青少年是在尋求認同的過程中建立其價值觀，所以價值教導較不易引起衝突緊張。

數位互動正向促進親子關係，在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中也扮演顯著的中介角色，相當程度對應電腦中介傳播對人際溝通及互動關係的論述（Walther, 2011），亦支持本研究的假設三與假設四。Zhao 等人（2010）區分中介效果為互補式（complementary mediation）與競爭式（competitive mediation），前者指間接效果和直接效果方向相同，後者則存在於兩效果方向相反時；數位互動在

生活管教與溫暖支持間扮演競爭式中介角色，讓生活管教對親子關係的負向效果，隨著數位互動中介效果的介入而降低；在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間則扮演互補式中介角色，使價值教導對溫暖支持的正向效果因數位互動的加入而更促進親子關係。這與過去一般民眾對「親子關係可能因使用 3C 產品產生親子衝突」的認知大不相同，對高中生上網行為的研究也提出，家長對於子女上網行為持支持的態度，可有效減弱高中子女的網路及遊戲沉迷（何慧卿、高旭繁，2021），善用數位互動形成親職策略可能成為教養的新方向。由於數位科技已逐漸變成父母和青少年互動的媒介之一，親子互動也從純粹面對面的實體互動轉成線上及實體互動共存，形成青少年的發展環境。與父母以數位互動的親子聯繫，也被視為是親子關係的表徵之一（Gentzler et al., 2011; Jensen et al., 2021），青少年因為感知父母在數位互動上的情感支持，而在與父母的關係上更緊密，且不只是正向的情感支持，研究也發現，當父母以數位工具或技術對子女監督時，父母從子女對訊息的揭露中更瞭解子女的行蹤或行為相關資訊，增加父母管教子女的資訊及知識，從而降低子女的外化行為（Jensen et al., 2021）。對子女價值觀社會化過程的研究也指出，青少年對父母價值觀的認知程度取決於親子聯繫的程度，父母的陪伴，日常生活大量的交談、與子女高頻率的互動，使得子女更容易認識父母的價值觀，是價值觀傳遞最好的方式（Stattin & Kim, 2018）。本研究結果確認數位互動對親子互動有所助益，增進了正向親子關係，並在父母的管教及親子關係中發揮作用。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若家長能夠善用數位科技或設備，將可藉著數位互動，在好的互動氣氛中傳遞自己對子女在生活管理或價值觀的期待，提高教養實踐成效。

青少男與青少年在管教、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各方面差異性均顯著，青少男除了感知與父母的衝突緊張高於青少年外，其餘在生活管教、價值教導、親子間的數位互動及與父母的溫暖支持等各面向分數都顯著低於青少年。如同研究指出，親子依附型態有性別差異，在教養或親子關係上也會顯出不同樣貌（鄒盛奇、伍新春，2023），青少年對父母依附需求較男生高，若親子關係惡化付出的代價也較青少男高（Keijsers et al., 2010），這些是可能形成青少年與父母關係親密、數位互動高及衝突低的因素。另外，管教與親子關係的相關在不同性別中有顯著差異，對青少男的生活管教越高，溫暖支持感受越低，緊張衝突越高，對青少年的生活管教越高，與父母的緊張衝突也越高，但不影響青少年與父母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對青少男的價值教導越高，其溫暖支持越高，但對青少年而言，價值教導與溫暖支持沒有顯著關係。此外，數位互動加入後在父母管教與親子關係間的中介作用也具有性別差異，對青少男的價值教導能透過數位互動增加溫暖支持的親子關係，但對青少男因生活管教造成溫暖支持感受降低或衝突緊張升高，卻不能經由與父母的數位互動減少，女生則恰好相反，數位互動能減低因生活管教造成衝突緊張的親子關係，但數位互動無法在對青少年的價值教導及親子關係的影響路徑產生中介作用，這些結果都顯示教養、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因性別不同有所差異，本研究的假設五獲得驗證。青少年仍對父母有心理依賴的需求，但獨立自主也是青少年時期重要的發展任務，其中，男孩不希望自己承受與社會對男性角色期待不一致時產生的社會壓力，更傾向從父母手中拿到自主權（Kobak et al., 1993; Ruhl et al., 2015），且青少男在生活領域減少與父母溝通的狀況較青少年多（Keijsers et al., 2010），相關研究指出，若考慮青少年對父母仍存在的心理依賴，以及越來越強烈的自主權需求，教養及親子互動要同時滿足親密和自主權需求是難以兼顧的，父母會因情況不同給予不同回應（Sentse, 2010）。青少年重視與父母的親密聯繫，青少男重視自主權的獲得，是否因此使得父母生活管教、價值教導對青少男、女在溫暖支持及衝突緊張等親子關係的感受不同，以及數位互動在其間的中介作用不一，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更深入探討。

總結而言，本研究區分生活管教及價值教導二向度的管教領域，展現此二向度對親子關係的不同作用，並發現此二向度對親子關係的影響因數位互動而改變。此結果呼應過去研究，家長的教養行為需根據不同的領域，或生活事件來做調整，以求符合情境及靈活性，達到子代個體化及適應性效果，尤其在青少年發展階段，個體對自主性及獨立性的要求越高，照顧者或教育者如何在生活領域事件逐漸放手，培養青少年的自主及獨立性，並在價值觀方面給予引導，展現出值得被尊重的行為，讓青少年將正確價值觀予以內化，均有待照顧者或教育者斟酌思考。其次，從本研究「數位互動高，正向親子關係高」的分析結果可以得知，當科技發展速度已遠超乎人類過去想像，數位互動不失為管教的一個策略，如何以正向的角度看待並善用數位科技，幫助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在不同的教養過程中增加對親子關係的正向影響，是未來親職教育可以努力的方向。隨著青少年身心發展

及對自主獨立的需求，父母在管教方式及權責界線的劃分是影響青少年期親子關係的主要因素，在數位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相關研究建議數位互動可以延續現實生活中親子互動的不足，正向促進親子關係（賴明政、陳佳君，2016；Walther & Burgoon, 1992）。再者，不同性別在管教與親子關係間影響不同，管教應參考性別對親子關係和子女發展的影響，減少因性別不同造成後天發展差異的持續擴大。由本研究分析結果可以得知，對青少男女的管教上，不同領域的管教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不一，數位互動策略可以增進親子關係，或改善管教造成親子關係的對立與緊張，這一點是教養上可以特別善用的地方。

最後，本研究受限於資料，僅能就子代觀點進行探討，然而親子關係是親代及子代共同經營而來，日後應採親子雙方的觀點相互比對。由於所有變項皆為青少年的自陳報告，在數位互動及親子關係的描繪上偏向子代觀點，且數位互動的測量係詢問青少年對「雙親」互動時的情形，管教題項亦詢問青少年對「雙親」管教的知覺，未能區分父親與母親，而價值教導僅有兩題，未完全符合分析要求等，凡此均為本研究之限制，在推論時需加注意。此外，本研究著重父母管教、數位互動及性別間差異的探討，而父母社經地位、親子相處情形、氣質、子女排行等皆可能產生影響，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親子關係可能隨個人與家庭發展階段而動態變化；父母雙方之間的教養行為也可能有所不同，造成不一致的親子關係；且數位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未來在管教、數位互動與親子關係的影響機制上，可蒐集縱貫性資料加以分析，以呈現其動態過程。關於本研究偏向子代觀點及某些題項採雙親合併觀點的研究限制，未來研究可採取親代、子代雙方觀點兼顧的對偶分析，或區分父母角色，分別採取父、母與青少年間之管教與親子關係的分析等，以期更貼近親子互動的樣貌。

註釋

¹ 本研究資料為 TASAL 與 TIGPS 合作之前期規劃資料，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NCKU HREC-E-112-370）之倫理審查，收錄於國教院「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TASAL）資料庫：2022 年 TASAL 計畫」，並獲國家教育研究院許可使用。

參考文獻

- 王珮玲、邱貞瑜、胡中凡、黃于庭（2015）：〈母親與子女對過去情緒經驗談話的性別差異〉。
《教育心理學報》，46，377-400。[Wang, P.-L., Chiu, C.-Y., Hu, J.-F., & Huang, Y.-T. (2015).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ther-child conversations about past emotion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6, 377-400.] <https://doi.org/10.6251/BEP.20140613>
- 吳仁偉（2011）：《虛擬社群人際互動模式之探討—以 Facebook 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Wu, J.-W. (2011).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A case study of the Faceboo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amkang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6846/TKU.2011.00672>
- 吳明燁（2016）：《父母難為：臺灣青少年教養的社會學分析》。五南圖書。[Wu, M.-Y. (2016). *Parenting dilemm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arenting teenagers in Taiwan*. Wu-Nan Book.]
- 何慧卿、高旭繁（2021）：〈高中生遊戲沉迷、網路沉迷與生活整體滿意度之研究—以家長對子女上網行為管教態度為調節變項〉。《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6（4），35-67。[Ho, H.-C., & Kao, S.-F.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game addi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their children's online behavior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66(4), 35-67.] [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2112_66\(4\).0002](https://doi.org/10.6209/JORIES.202112_66(4).0002)

- 林文瑛 (2003)：〈教養觀背後的人性觀—以能力觀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20，253–293。[Lin, W.-Y. (2003).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on parenting belief: The case of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20, 253–293.] <https://doi.org/10.6254/2003.20.253>
- 林文瑛、王震武 (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學研究》，3，2–92。[Lin, W.-Y., & Wang, J.-W. (1995). Zhongguo fumu de jiaoyangguan: Yanyiaoguan huò damaguan?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 2–92.] <https://doi.org/10.6254/1995.3.2>
- 林姿慎、林如萍 (2023)：〈父母早期親職行為與中老年期心理福祉：對成年子女成就評價的影響機制〉。《老年學研究》，2，57–88。[Lin, T.-S., & Lin, J.-P. (2023). Effect of parents' early parenting behavior on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t middle and old ag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dult children achievement appraisal. *Gerontological Studies*, 2, 57–88.] [https://doi.org/10.29703/JGS.202304_\(2\).0003](https://doi.org/10.29703/JGS.202304_(2).0003)
- 林惠雅 (2012)：〈管教責任性、服從義務性與服從管教〉。《教育心理學報》，44，139–158。[Lin, H.-Y. (2012).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of guan-chiao, obligation of obedience, and obedience of guan-chiao.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4, 139–158.] <https://doi.org/10.6251/BEP.20110815.2>
- 林惠雅 (2014)：〈青少年知覺父母教養行為、服從義務性與服從管教之關聯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0，219–271。[Lin, H.-Y. (2014).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practices, obligation to obey, and obedience in guan-chiao.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60, 219–271.]
- 周玉慧 (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7，67–89。[Jou, Y.-H. (2015). Longitudinal eff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 67–89.] <https://doi.org/10.6129/CJP.20140831>
- 周玉慧、吳明燁、黃朗文 (2010)：〈當中年遇到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與父母中年生活感受〉。《台灣社會學》，20，1–37。[Jou, Y.-H., Wu, M.-Y., & Huang, L.-W. (2010). When middle-aged parents meet adolescent childre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tterns and parent's midlife perceptions. *Taiwanese Sociology*, 20, 1–37.] <https://doi.org/10.6676/TS.2010.20.1>
- 邱皓政 (2011)：〈當 PLS 遇上 SEM：議題與對話〉。《αβγ 量化研究學刊》，3 (1)，20–53。[Chiou, H.-J. (2011). When PLS meets with SEM: Issues and dialogues. *αβγ of the Journal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3(1), 20–53.]
- 胡肇勳、程景琳 (2007)：〈國小低年級孩童與父母在不同領域衝突的反應方式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481–499。[Hu, C.-H., & Cheng, C.-L. (2007). Response types in Taiwanese lower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during different parent-child conflic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8, 481–499.] <https://doi.org/10.6251/BEP.20070124>
- 翁敏甄、陳嘉成 (2018)：〈男女幸福大不同？—父母教養、教師管教與同儕關係品質對不同性別國中生幸福感預測之差異分析〉。《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數理科技類》，32 (2)，57–77。[Weng, M.-C., & Chen, C.-C. (2018). Are degrees of well-being between genders different?—Comparative

- analysis of gender well-being as effected by parenting, teacher discipline, and peer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Mathematics, Science & Technology*, 32(2), 57–77.]
-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2) : 《TASAL、臺灣數位世代追蹤研究及國內重要教育調查合作發展之規劃》(計畫編號: NAER-2022-010-E-1-1-C5-01)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4333521>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2). *TASAL, Taiwan i-Generation Panel Study ji guonei zhongyao jiaoyu diaocha hezuo fazhan zhi guihua* (Report No. NAER-2022-010-E-1-1-C5-01).
<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4333521>]
- 程雅好、王郁琮 (2021) : 〈青少年親子關係類型及親子互動差異比較: 因素混合模式分析〉。《教育心理學報》, 52, 707–730。[Cheng, Y.-Y., & Wang, Y.-C. L. (2021). Heterogeneou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nd effects on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factor mixture analysi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2, 707–730.]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3_52\(3\).0010](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3_52(3).0010)
- 鄒盛奇、伍新春 (2023) : 〈父母衝突與青少年同伴依戀的關係: 親子依戀的中介作用及性別差異〉。《心理發展與教育》, 39, 798–807。[Zou, S., & Wu, X. (2023).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conflict and peer attachment: An examination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adolescent attach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9, 798–807.]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3.06.05>
- 楊朝鈞、簡晉龍 (2019) : 〈臉書讓我更幸福? 現實與線上互動對主觀幸福感之作用暨中介變項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 51, 183–205。[Yang, C.-J., & Chien, C.-L. (2019). Facebook makes me happier? The effects of realistic and online interac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ir mediating variabl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1, 183–205.]
[https://doi.org/10.6251/BEP.201912_51\(2\).0001](https://doi.org/10.6251/BEP.201912_51(2).0001)
- 翟健 (2022) : 〈基於社交媒體的高中生親子互動式外語學習產品探索〉。《國外英語考試教學與研究》, 4 (2), 138–145。[Zhai, J. (2022). Exploring products used by upper secondary students on digital platform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with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Overseas English Testing: Pedagogy and Research*, 4(2), 138–145.]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22.44016>
- 蔡淑琴 (2013) : 〈臺南市國中生手機使用行為與人際關係及親子互動之相關研究〉。《教育研究論壇》, 4, 1–21。[Tsai, S.-C. (2013). A study on mobile phone use behavior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parent-children interaction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nan. *Forum of Education Research*, 4, 1–21.]
- 賴明政、陳佳君 (2016) : 〈行動通訊應用軟體的溝通特質對親子關係維持與家庭滿意之影響〉。《東吳經濟商學學報》, 93, 53–92。[Lai, M.-C., & Chen, J.-J. (2016).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obile social communication apps, relational maintaining in parent-adolescen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Soochow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93, 53–92.]
- Ashraf, F., & Najam, N. (2011).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s*, 21(2), 77–92.

- Bacigalupe, G., & Lambe, S. (2011). Virtualizing intimac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therapy. *Family Process*, 50(1), 12–26.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10.01343.x>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Hall.
- Barni, D., Zagrean, I., Russo, C., & Danioni, F. (2023).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values: From parent-child value similarity to parent-child value continuit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5(4), 974–991.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231163939>
- Bartholomew, M. K., Schoppe-Sullivan, S. J., Glassman, M., Kamp Dush, C. M., & Sullivan, J. M. (2012). New parents' Facebook use at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Family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pplied Family Studies*, 61(3), 455–469.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12.00708.x>
- Baumrind, D. (1967). Child care practices anteceding three patterns of preschool behavior. *Genetic Psychology Monographs*, 75(1), 43–88.
- Baumrind, D. (2005).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adolescent autonomy.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08, 61–69. <https://doi.org/10.1002/cd.128>
- Branje, S. (2018). Development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Conflict interactions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2(3), 171–176. <https://doi.org/10.1111/cdep.12278>
- Brook, J. S., Richter, L., & Whiteman, M. (2000). Effects of parent personality, upbringing, and marijuana use on th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39(2), 240–248. <https://doi.org/10.1097/00004583-200002000-00025>
- Brouwer, T., Galeotti, F., & Villeval, M. C. (2023). Teaching norms: Direct evidence of parental transmiss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33(650), 872–887. <https://doi.org/10.1093/ej/ueac074>
- Carvalho, J., Francisco, R., & Relvas, A. P. (2015). Family functioning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ow do they relate? A literature review.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5, 99–10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4.11.037>
- Chan, G. H., Lee, G. K. W., Kong, C. Y. W., & Lo, T. W. (2022). An innovative model of positive educa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values: An evaluation of project bri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7), Article 379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9073797>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https://doi.org/10.2307/1131308>
- Clark, L. S. (2011). 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for the digital age. *Communication Theory*, 21(4), 323–343.
<https://doi.org/10.1111/j.1468-2885.2011.01391.x>
- Costin, A. (2022). Parental disciplinary practices seen through children's eyes. *Journal Plus Education*, 3(2), 35–45. <https://doi.org/10.24250/jpe/2/2022/ac>
- Darling, N., Cumsille, P., & Martínez, M. L. (2007). Adolescents' as active agents in the socialization

- process: Legitimacy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obligation to obey as predictors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0(2), 297–311.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6.03.003>
- Darling, N.,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3(3), 487–496.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3.3.487>
- Davies, J. J., & Gentile, D. A. (2012). Responses to children's media use in families with and without siblings: A family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Family Relations*, 61(3), 410–425.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12.00703.x>
- Duncan, L. G., Coatsworth, J. D., & Greenberg, M. T. (2009). A model of mindful parenting: Implications f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prevention research.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2(3), 255–270. <https://doi.org/10.1007/s10567-009-0046-3>
- Erikson, E. H. (1994).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W. W. Norton & Company.
- Garcia, O. F., Fuentes, M. C., Gracia, E., Serra, E., & Garcia, F. (2020). Parenting warmth and strictness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Parenting styles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20), Article 7487.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7207487>
- Gentzler, A. L., Oberhauser, A. M., Westerman, D., & Nadorff, D. K. (2011).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Links to loneliness, attachment,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1–2), 71–74.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09.0409>
- Hair, J. F., Jr., Black, W. C., Babin, B. J., & Anderson, R. E. (2010). Canonical correlation: A supplement to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In J. F. Hair, Jr., W. C. Black, B. J. Babin, & R. E. Anderson (Eds.),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A global perspective* (7th ed.). Pearson Prentice Hall Publishing.
- Hall, J. A. (1987).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 empirical review. *Adolescence*, 22(88), 767–789.
- Huisman, S., Edwards, A., & Catapano, S. (2012).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 the Community*, 2(1), 44–62.
- Işık Akın, R., Breeman, L. D., Meeus, W., & Branje, S. (2020).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as a predictor of leaving hom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79(1), 81–90.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9.12.017>
- Jensen, M., George, M. J., Russell, M. A., Lippold, M. A., & Odgers, C. L. (2021). Daily parent-adolescent digital exchanges. *Research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49(9), 1125–1138.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20-00765-x>
- Keijsers, L., Branje, S. J. T., Frijns, T., Finkenauer, C., & Meeus, W. (2010). Gender differences in keeping secrets from parents in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1), 293–298. <https://doi.org/10.1037/a0018115>
- Kloep, M., & Hendry, L. B. (2010). Letting go or holding on? Par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children during emerging adulthood.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4), 817–834. <https://doi.org/10.1348/026151009X480581>

- Kobak, R. R., Cole, H. E., Ferenz-Gillies, R., Fleming, W. S., & Gamble, W. (1993). Attachment and emotion regulation during mother teen problem solving: A control theory 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64*(1), 231–245. <https://doi.org/10.2307/1131448>
- Korniichuk, S. V., & Oliynyk, O. (2022). The role of parental attitude towards children in the forma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Humanities Studios: Pedagogy, Psychology, Philosophy, 10*(1), 117–123. [https://doi.org/10.31548/hspedagog13\(1\).2022.117-123](https://doi.org/10.31548/hspedagog13(1).2022.117-123)
- Lanigan, J. D. (2009). A sociotechnological model for family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Ho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fect family life.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45*(6–8), 587–609.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0903224194>
- Luescher, K., & Pillemer, K. (1998). 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2), 413–425. <https://doi.org/10.2307/353858>
- Maccoby, E. E., & Martin, J. A. (1983). Soci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amily: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 E. M. Hetherington (Ed.), P. H. Mussen (Series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4th ed., Vol. 4, pp. 1–101). John Wiley & Sons.
- Marchant, M., Young, K. R., & West, R. P. (2004).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teaching on compliance behavior of children.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1*(3), 337–350. <https://doi.org/10.1002/PITS.10165>
- Mesch, G. S. (2006).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et: Exploring a family boundaries approach.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6*(2), 119–13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698jfc0602_2
- Niu, G., Yao, L., Wu, L., Tian, Y., Xu, L., & Sun, X. (2020). 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self-control.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16*, Article 105247.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20.105247>
- Nucci, L. P. (1996). Morality and the personal sphere of actions. In E. S. Reed, E. Turiel, & T. Brown (Eds.), *Values and knowledge* (pp. 41–60).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O'Connor, T. G., Matias, C., Futh, A., Tantam, G., & Scott, S. (2013). Social learning theory parenting intervention promotes attachment-based caregiving in young children: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 42*(3), 358–370. <https://doi.org/10.1080/15374416.2012.723262>
- Peng, S. S., & Wright, D. (1994). Explan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Asian American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7*(6), 346–352. <https://doi.org/10.1080/00220671.1994.9941265>
- Pinquart, M., & Kauser, R. (2018). Do the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styles with behavior problem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vary by culture? Results from a meta-analysis. *Cultural Diversity &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4*(1), 75–100. <https://doi.org/10.1037/cdp0000149>
-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part 1. *On the Horizon, 9*(5), 1–6. <https://doi.org/10.1108/10748120110424816>
- Ruhl, H., Dolan, E. A., & Buhrmester, D. (2015). Adolescent attachment trajectories with mothers and fathers: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 and gender. *Journal of Research on*

- Adolescence*, 25(3), 427–442. <https://doi.org/10.1111/jora.12144>
- Şahin, F. T. (2014). Mother-child relation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is re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ulture and Science*, 2(3), 79–88. <https://doi.org/10.14486/IJSCS203>
- Sentse, M. (2010). *Bridging contexts: The interplay between family, child, and peers in explaining problem behavior in early adolesce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 Shek, D. T. (2000).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treatment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teenage childre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5(137), 135–146.
- Smetana, J. G. (2006). Social-cognitive domain theory: Consistencies and variations in children's moral and social judgments. In M. Killen & J. G.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pp. 119–153).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Smetana, J. G., & Asquith, P. (1994).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conceptio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and personal autonomy.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47–1162.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1994.tb00809.x>
- Smetana, J. G., & Daddis, C. (2002). Domain-specific anteceden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monitoring: The role of parenting beliefs and practices. *Child Development*, 73(2), 563–580.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424>
- Stafford, L., & Hillyer, J. D. (2012).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12(4), 290–312. <https://doi.org/10.1080/15358593.2012.685951>
- Stattin, H., & Kim, Y. (2018). Both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project their own values when perceiving each other's val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2(1), 106–115. <https://doi.org/10.1177/0165025417713728>
- Steinberg, L. (2001). We know some things: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1(1), 1–19. <https://doi.org/10.1111/1532-7795.00001>
- Steinfeld, C. W. (1986).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an organizational setting: Explaining task-related and socioemotional uses.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9(1), 777–804. <https://doi.org/10.1080/23808985.1986.11678637>
- Tobin, J., Hsueh, Y., & Karasawa, M. (2009).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oma, C. L. (2015). Online dating. In C. R. Berger, M. E. Roloff, S. R. Wilson, J. P. Dillard, J. Caughlin, & D. Solomon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1–5). John Wiley & Sons.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540190.wbeic118>
- Turiel, E.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knowledge: Morality and conv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ther, J. B. (2011). Theorie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M. L. Knapp & J. A. Daly (Eds.), *The 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4th ed., pp. 443–479). SAGE Publications.
- Walther, J. B., & Burgoon, J. K. (1992).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1), 50–88.
<https://doi.org/10.1111/j.1468-2958.1992.tb00295.x>
- Wu, M.-Y. (2013). The concept of guan in the Chines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C.-C. Yi (E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pp. 29–49).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4081-5_2
- Yang, C. (2018). Social media as more than a peer space: College freshmen encountering parents on Facebook.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33(4), 442–469.
<https://doi.org/10.1177/0743558416659750>
- Yao, M. Z., & Ling, R. (2020). “What i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5(1), 4–8.
<https://doi.org/10.1093/jcmc/zmz027>
- Yoo, H. N., & Smetana, J. G. (2022). Distinctions between moral and conventional judgments from early to middle childhood: A meta-analysis of social domain theory researc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8(5), 874–889. <https://doi.org/10.1037/dev0001330>
- Zhao, X., Lynch, J. G., Jr., & Chen, Q. (2010). 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 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7(2), 197–206. <https://doi.org/10.1086/651257>

收稿日期：2023 年 11 月 30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2 月 12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2 月 14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3 年 12 月 27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4 月 10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5 月 03 日
 六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5 月 20 日
 七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6 月 07 日
 八稿修訂日期：2024 年 06 月 13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4 年 06 月 13 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4, 56(2), 281–30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Guan-Chiao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Digital Interaction

Tzu-Shen Lin¹ and Yuh-Huey Jou²

With rapid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digital tools and the Internet have become integral to human life.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not only facilitated payment,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but also transformed patter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family serves as a vital space for a child's socialization, both into societal norms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s of their family (Korniichuk & Oliinyk, 2022). Internet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 parenting practices (Clark, 2011), particularly during adolescence. However, most studies on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focused on Western instead of Asian contexts. Building on the work of Chao et al. (1994) and others regarding Chinese families, this study explored parental discipline in a Chinese cultural framework, referred to as *guan-chiao* to distinguish it from Western parenting model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guan-chiao*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digital interaction in improving these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differences in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se effect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Smetana (2006), a parent's disciplinary approach should vary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domain of a child's life. For instance, parents might adopt a more *laissez-faire* approach to areas perceived by children as personal, such as leisure activities or social relationships. Strict control in these domains often leads to resistance because children view such matters as their own personal affairs. By contrast, parents should b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guiding their children's mo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ethical behavior, respect for others, and adherence to social norms. Social learning theory suggests that children model their behavior after that of their parents, making it essential for parents to exemplify the qualities they wish to instill in their children.

Because different areas of a child's life present distinct issues, children may respond differently to parental discipline in differing domain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s adopting tailored disciplinary methods for different area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ir children (Smetana, 2006). The tension between a child's desire for autonomy and a parent's responsibility to socialize their child into becoming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society leads to parent–child conflict, particularly in *guan-chiao*. However, values instruction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for fostering positi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igital interaction can help bridge gaps caused by limited face-to-fac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offering low immediacy and high media richness. Therefore, this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digital interaction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guan-chiao* o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digital interaction mitigates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domain of lifestyle choices and enhances positive effects in the domain of values instruction.

¹ Research Center for Testing and Assessment,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²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Corresponding author:

Tzu-Shen Lin, Research Center for Testing and Assessment,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mail: morenda918@gmail.com

This study used data from the 2022 Taiw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sample included 5430 ninth-grade students (2,454 girls and 2,976 boys) who provided complete responses. These students rated their perception of parental strictness on a 10-item guan-chiao scale, which assessed domains such as clothing, appearance, style, curfew regulations, attitude toward older adult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Responses were recorded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1 (not strict at all) to 4 (very strict).

The results of principal axis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guan-chiao construct comprises two domains: discipline regarding lifestyle and values instruction. Adolescents reported that their parents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values instruction” than on “discipline regarding lifestyle.” Items related to digital interaction measured the frequency of digital media interac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These items included statements such as “I interact with my parents on social media,” “I send photos or messages to my parents on social media,” “My parents are with me when I go online,” “I chat with my parents about interesting events or incidents happening online,” and “My parents and I discuss our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what we have experienced online.” Responses were rated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1 (never) to 4 (often),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more frequent digi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Items assess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how adolescents feel regarding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parents. Questions included “How do you get along with your parents?” as well as items such as “Being criticized or blamed,” “Being understood and affirmed,” and “Being cared for.” These responses were also rated on a 4-point Likert scale from 1 (never) to 4 (often).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se items could be grouped into two factors: warmth (three items) and tension (two items).

According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alysis, both the direct-effect and mediated-effect models had good fit. For the direct-effect model, the fit indices were $\chi^2(234, N = 5,430) = 2,675.89, p < .001$,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5, Tucker–Lewis index (TLI) = .95,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5, and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5. The mediated-effect model had similar fit indices: $\chi^2(234, N = 5,430) = 2,675.89, p < .001$, CFI = .95, TLI = .95, RMSEA = .04, and SRMR = .04.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greater guan-chiao in the lifestyle domain was associated with a warm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a = -.16, p < .001$) but also with a higher level of tension ($\beta = .33, p < .001$). Digital interaction mediated the effect of guan-chiao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reducing tension caused by lifestyle-domain discipline ($\beta = -.02, p < .001$) and enhancing the warmth associated with values instruction ($\beta = .04, p < .001$). Furthermore, the SE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uan-chiao,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differe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The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Greater discipline in the lifestyle domain is associated with a less warm and more conflictu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owever,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mitigated by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interaction. By contrast, discipline in the values instruction domain is associated with warmer and less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s,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enhanced by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interaction. Overall,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 interaction is consistently associated with a warmer and less conflictual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both domai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actors differed between boys and girls. For boys, values instruction strengthened a warmth-bas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rough digital interaction. However, digital interaction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style discipline and a tension-base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y contrast, for girls, digital interaction reduced tension i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ssociated with lifestyle discipline but did no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s instruction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s and educators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discipline related to values and that related to lifestyle preferences. They should als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discipline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cross the genders. To view and use digital technology positively, they should engage in open conversa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regarding their use of the Internet. Increasing digital interactions at various stages of a child’s development can positively affec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ompensate for limited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Future research could benefit from collecting longitudinal or parent–child dyadic data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scipline,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ffects each other. This approach would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ynamic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se mechanisms and offer clearer guidance on fostering positive digi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Keywords: adolescents, guan-chiao, digital interac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gender difference